

淘宝村、移动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实践

卓雯君¹, 庞新生^{1*}, 龙 娇²

(1.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 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数字化新乡村的大量涌现, 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乡村的生产、生活、生计及城乡关系, 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新城镇化进程。本文系统梳理了淘宝村、移动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淘宝村是经由草根创业者通过信息网络参与全国乃至国际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突破传统空间网络束缚, 实现乡村地位、规模与功能跃迁, 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指出淘宝村有效解决了传统城镇化的遗留问题, 是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考。基于 2013—2021 年全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淘宝村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 淘宝村能够直接显著促进城镇化水平;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在淘宝村与城镇化水平之间起调节作用; 淘宝村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 应该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关键词: 淘宝村; 移动互联网; 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299.21; F724.6

Taobao Village,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s

ZHUO Wenjun¹, PANG Xinsheng^{1*}, LONG Jiao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2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The proliferation of new digital villages, represented by Taobao villages, is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life, livelihood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villages, and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bao villages,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urbaniz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aobao Village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new urbanization through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s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s,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spatial network constraints, and achieving a leap in the status, scale and function of villag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aobao Village effectively solves the legacy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nter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practic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cities) across China from 2013-2021, the basic and heterogeneou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Taobao villages affecting new urbanization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aobao villages can directly 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 urbanization level; mobile Internet penetration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aobao villages and urbanization level; there i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aobao villages on urbanization, and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Keywords: Taobao Village; Mobile Internet; New urbanization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要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2011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 50%, 在拥有广大农村地域和大量农业人口的背景下, 开创了二元的城镇化模式, 即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城市集聚模式和以乡镇企业为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在广大乡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粮食生产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对策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21D042)阶段性成果。

**卓雯君(1996—), 女, 河南郑州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农村发展。E-mail: zhuowenjun@bjfu.edu.cn;

通信作者: 庞新生(1970—), 男, 山西晋中人, 博士、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农林经济管理。Email: pxinsheng@bjfu.edu.cn

村地域开展的自下而上的就地城镇化模式^[1]。两种模式相互作用，完成了大量农村人口的职业和空间转移（包括流动人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新兴科技产业的兴起，生产要素进一步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大城市地区聚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聚集成为 21 世纪中国城镇化的主流。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无法避免的出现城镇化发展质量上的诸多问题，城乡等级分化导致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倒退和小城镇凋敝等经济社会问题愈发突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入网门槛的大幅降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经济业态的方兴未艾，中国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截至 2022 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10.67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9%¹。互联网平台极大拓展了城乡间的互联互通程度，促进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使城乡之间生产和消费体系都呈现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特征^[2]。城乡网络单元再结构化为自由链接的空间，乡村地区可以开放地融入城市的社会生产文化方式和市场交易分工体系。地方发展潜力不再过分依赖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而更多地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空间组织之间的联结能力，这极大削弱了城乡区域间的规模等级，为人、财、物等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的回流拓宽了渠道^[3]。淘宝村（镇）²的井喷式发展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乡转型的标志性代表。淘宝村的形成和发展是互联网电商对乡村地区物质空间和生产体系的全范围重塑，这一发端于中国信息时代的新现象，正改变着中国 30 多年来的城乡要素流动关系。截止到 2022 年，淘宝村覆盖到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达到 5425 个，比上年增加 1115 个，总量约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 1%。淘宝镇覆盖到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达到 1756 个，比上年增加 638 个，总量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 5.8%³（图 1）。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淘宝村在中国乡村的蓬勃发展，一场新的自下而上城镇化进程日益浮现，在中国乡村发展、城乡统筹达到瓶颈之际，为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我们认为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新型城镇化是发生在农村或乡镇等基层行政单元，由基层政府发动、农民主体参与，农村人口实现本地非农化就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核心是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职业非农转化。

淘宝村的集聚与裂变是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部分淘宝村目前只在产业兴旺上有所突破，其他方面都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加速器”，以城乡互补、工农互促、共同繁荣为特征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尚未完全形成，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形成了一定制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充分把握基本国情与农情、顺应城乡发展普遍规律，以城乡融合重塑乡村系统。从淘宝村建设到城乡融合再到全面的乡村振兴，乃至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有效实现“四化同步”，既是淘宝村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重难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的历史使命。由于是发端于中国信息时代的新现象，当前对淘宝村的研究尚属初发阶段，实践超前于理论，需要加快研究步伐。

1.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指聚集在某个村落的网商，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网络商业群聚现象。以“淘宝村”为代表的乡村出现了特殊增长，构成了当下乡村发展的新方向。

3.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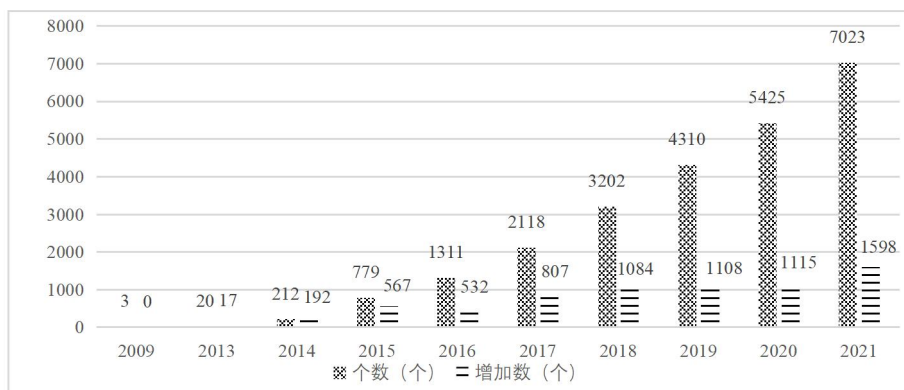


图1 2009—2021年全国淘宝村的数量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淘宝村与新型城镇化

淘宝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的乡村产业集群,其形成的初始阶段是乡村创业者通过不断尝试,发掘蓝海产品⁴、形成创业突破和示范效应的过程。是基层政府、广大农民、社会组织、电商企业等合力参与形成的就地城镇化,推动主体和空间载体的双重下沉,从底层激活了城镇化长期以来的休眠主体。首先,网商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将线下的小众商品和实体店铺直接对接线上的外部市场,抢占蓝海市场的先机。同时,中国乡村仍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维系的熟人社会,这种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一种原始信用筹码^[4]。涟漪式熟人社会的传播在空间上有明显的近域扩散效应,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持下,熟人网络的扩散半径和扩散效率快速提升。在此基础上,接触了先进知识和前沿技术的返乡创业人员、新农人群体及乡村精英,在产业成长和扩散过程中承担起电商发展带头人的责任,实质性地实现资源要素向乡村回流,信息、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这里交互,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有效的空间载体,从而形成新型城镇化进程快速扩张的动力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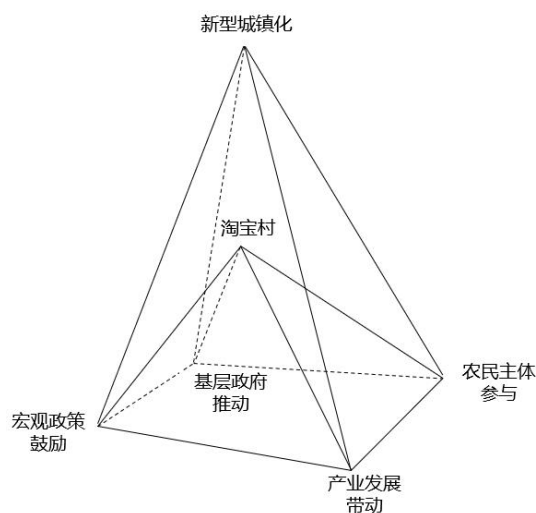


图2 淘宝村与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模型图

1.2 淘宝村与互联网平台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相较于城市,互联网经济对县域、农村的发展作用更为突出,尤其是对于区位偏远、内生动力不足的县域,城乡数字鸿沟缩小、互动方式变革和社会参与度增强,均为当地发展提

4.蓝海产品的对立面是红海。“红海”代表在已知的市场空间存在的所有产业,“蓝海”则代表未知的市场空间,“蓝海产品”即无市场竞争产品或行业尚处于非激烈竞争阶段的产品通俗点讲就是还没有占据市场,无人知晓却极具潜力的产品。

供了实体产业发展新平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动力。移动互联网进入下的乡村突破了三大产业逐步推进的传统模式，村民基于网络销售平台，以产品自销、代销等多种方式参与电商活动，形成“农户+网商”和“三产融合”的本地兼业化生产，实现了非农化就业。现代文明和市场观念借由“自由”“包容”的互联网平台向乡村地区深入，打开了乡村地区相对逼仄的文化环境，进一步推动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塑造、城镇文明的融合及现代技术的普及，转变为村民全面的生活现代化。随着淘宝村不断发生集群与裂变，不断产生新的业务形式及更大的空间需求，传统农村的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和相关配置都难以满足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长的需求，乡村空间的结构重组和优化配置逐渐促使更加集约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并逐渐探索在镇域甚至更大的区域空间，由此实现集约的空间城镇化。三个方面良性互动，推动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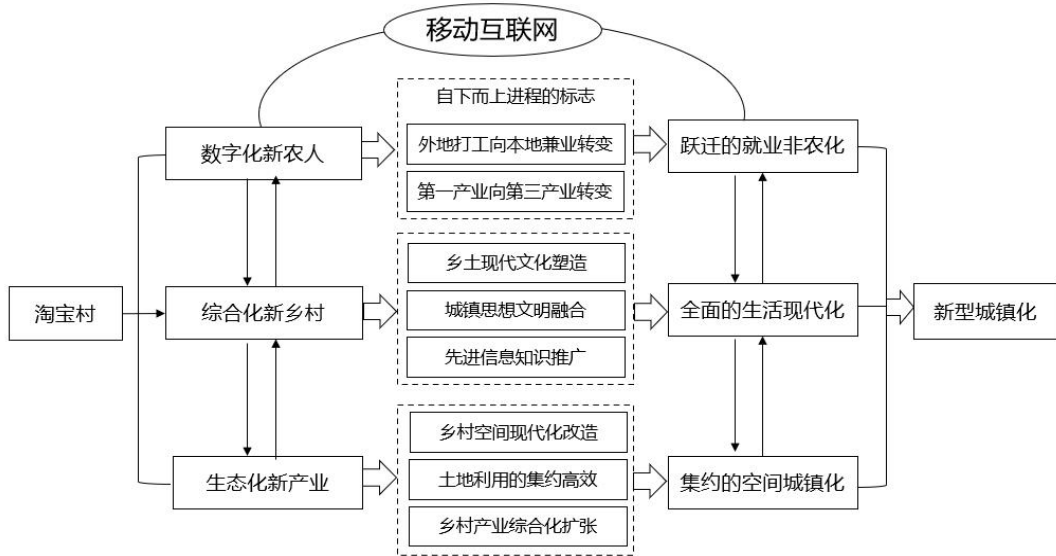


图3 移动互联网在淘宝村与城镇化路径之间的调节机制图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1：淘宝村建设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H2：移动互联网在淘宝村与新型城镇化起到了调节作用，且强化了淘宝村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H3：移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淘宝村建设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选择与设定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经济下淘宝村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固定效应模型是一种通过控制面板数据中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实证方法，适合解决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进而提升模型整体的估计效果。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通过引入移动互联网这个关键变量，分析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在淘宝村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调节作用，故参考温忠麟等的做法^[5]，构建调节效应检验模型：

第一步，针对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直接传导机制设定如下模型：

$$Urb_{i,t} = \alpha_0 + \alpha_1 tbc_{i,t} + \alpha_m control_{i,t} + \lambda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第二步，探究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对城镇化水平的直接影响：

$$Urb_{i,t} = \alpha_0 + \alpha_2 net_{i,t} + \alpha_m control_{i,t} + \lambda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第三步，将淘宝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同时纳入模型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Urb_{i,t} = \alpha_0 + \alpha_1 tbc_{i,t} + \alpha_2 net_{i,t} + \alpha_m control_{i,t} + \lambda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第四步，测度移动互联网使用在淘宝村与城镇化水平中的调节效应，将两者的交互项纳入模型中：

$$Urb_{i,t} = \alpha_0 + \alpha_1 tbc_{i,t} + \alpha_2 net_{i,t} + \alpha_3 tbc_{i,t} * net_{i,t} + \alpha_m control_{i,t} + \lambda_i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Urb_{i,t}$ 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城镇化水平， $tbc_{i,t}$ 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淘宝村数量， $net_{i,t}$ 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control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α_0 为截距项， α_1 为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的拟合系数， α_2 为移动互联网对城镇化水平的拟合系数， α_3 为移动互联网调节下的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的拟合系数， α_m 为控制变量的拟合系数， λ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η_i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设置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地区城镇化水平：这里通过测算各地区非农业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来度量城镇化率，以此来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6]。

2.解释变量。淘宝村建设水平：通过阿里研究院公开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中的年度淘宝村的数量来衡量淘宝村建设水平^[7]。

3.调节变量。移动互联网水平：这里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来衡量移动互联网水平。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高的地区具备繁衍淘宝村及“新农人”巨大潜力，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的概率，包括成为工资获得者以及自我雇佣^[3]。

4.控制变量

自下而上的新型城镇化作为基层主体自发推动的城镇化进程，与各地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传统、技术水平、基建水平和政策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1)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交易的地理模式和分工的空间组织模式相互作用的产物，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8]。

(2) 产业发展水平。从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城镇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工业经济和规模经济下产业资源集聚、产业要素集群、产业转型升级、城乡产业融合、产城互动以及城乡间生产体系优化配置的过程^[9]。

(3) 人口转移情况。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断诱发乡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进行城乡转移，一方面出于积累个人财富提升家庭整体消费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信息与资源储备，为回乡创业做准备^[4]。两方面共同推动小城镇的发展。

(4) 科技教育水平。城镇化外推力是城镇的辐射作用，内驱力则是人们对于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筑牢农村教育阵地与维持乡村文化存续的重要一步^[10]。

(5) 基础设施水平。基础设施是城镇系统有效运转的关键环节，涉及诸多产业链，基础设施的增加可以显著改善城镇地理空间的布局、城镇基础功能的有效发挥、以及城镇环境的综合承载力，进而影响城乡融合^[11]。

(6) 制度环境情况。政府关于城乡规划制度、征地制度和用地制度、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实施可以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12]。

(7) 人口密度情况。人口密度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可反映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率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13]。

表 1 变量说明

指标类型	变量选择	具体指标	计算方式	指标含义
被解释变量	城镇化水平	地区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的比值	反映各地城镇化的发展的水平
解释变量	淘宝村情况	地区淘宝村数量	淘宝村数量	反映各地淘宝村的发展水平。
调节变量	移动互联网情况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地区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反映各地互联网的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人均 GDP	反映经济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
	产业发展水平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	反映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

		总值	影响。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总值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地区就业总人数	
		总人数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地区就业总人数	
		总人数	
人口转移情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反映人口转移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地区就业总人数	
科技教育水平	教科文卫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率	教科文卫事业支出/地方财政总支出	反映科技发展和教育基础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地区拥有大学生数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学生授予学位数	
基础设施水平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人口总额	反映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
	公路里程数	公路里程数	
制度环境情况	农产品商品化率	地区农产品商品量/地区农产品总产量	反映市场化程度对城镇化的发展影响。
人口密度情况	每单位城市面积中城市人口的比重	地区城市人口数/城市面积	反映人口密度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2.3 数据来源与描述

鉴于 2012 年之前农村电商处于萌芽阶段，全国各区域淘宝村数量无明显变动，自 2013 年以来，在国家电商下乡的政策扶持下，淘宝村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原则出发，因此本文以 2013 年为起点，选取 2013—2021 年除港澳台地区以外我国的 31 个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及阿里研究院。以及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类公开信息，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具体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2。本文对调节变量 C1、C6、C9、C11 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化率	urb	279	61.236	12.042	26.230	89.300
淘宝村数量	tbc	279	115.265	319.421	0.000	2426.000
移动互联网	net	279	59.091	11.649	34.100	90.883
人均 GDP	logC ₁	279	10.994	0.416	10.172	12.173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C ₂	279	39.733	7.963	15.713	54.100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C ₃	279	50.966	8.636	35.400	84.150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C ₄	279	24.859	7.890	11.334	44.764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C ₅	279	48.706	8.504	33.482	81.076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logC ₆	279	9.971	0.259	9.406	10.853
城镇登记失业率	C ₇	279	0.013	0.007	0.005	0.049
教科文卫事业费占 地方财政支出比率	C ₈	279	0.281	0.042	0.176	0.388
地区拥有大学生数	logC ₉	279	11.435	0.951	8.478	12.681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C ₁₀	279	5.082	1.821	1.129	9.758
公路里程数	logC ₁₁	279	11.730	0.840	9.466	12.898
农产品商品化率	C ₁₂	279	0.048	0.078	0.000	0.425
每单位城市面积中 城市人口的比重	C ₁₃	279	0.502	0.235	0.093	1.233

3 实证分析

3.1 基本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 Stata16.0 软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 1 仅纳入解释变量淘宝村和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模型 2 将解释变量调整移动互联网，与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模型 3 在 1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集合；模型 4 在 2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集合。结果如表 3 所示：淘宝村数量和移动互联网均对城镇化水平有直接影响，分别在 10%和 1%的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合集后，依然在 5%和 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分别为 0.017 和 0.152，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 3 淘宝村建设对城镇化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Variables	模型1 (1)	模型2 (2)	模型3 (3)	模型4 (4)
tbc	0.006* (0.000)		0.017** (0.016)	
net		0.301*** (0.028)		0.152*** (0.033)
logC ₁			0.297 (2.296)	-2.104 (2.117)
C ₂			-0.132* (0.079)	0.043 (0.080)
C ₃			-0.172** (0.074)	-0.035 (0.075)
C ₄			78.640*** (11.781)	58.443*** (12.474)
C ₅			98.936*** (10.711)	69.615*** (9.428)
logC ₆			11.208* (6.417)	7.825 (6.263)
C ₇			6.885	-3.940

			(19.163)	(18.705)
C ₈			-5.988 (5.016)	-3.791 (4.805)
logC ₉			10.613*** (2.448)	9.160*** (2.393)
C ₁₀			0.441*** (0.088)	0.401*** (0.086)
logC ₁₁			9.885*** (2.625)	3.416 (2.735)
C ₁₂			-3.591 (3.039)	0.367 (2.911)
C ₁₃			0.066 (1.156)	1.755 (1.123)
_cons	50.055*** (0.471)	37.924*** (1.195)	-5.811 (6.679)	-3.587 (6.598)
Pro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79	279	279	279
R ²	0.991	0.994	0.996	0.99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2 调节效应分析

移动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结构，为检验移动互联网是否在淘宝村建设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调节效应，本研究根据上文构建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在模型 5 中检验了移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直接影响效应；模型 6 在 5 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 7 中，为避免共线性影响，将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和淘宝村数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构建去中心化后的移动互联网和淘宝村的交互项，放入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5 表达了淘宝村数量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直接传导机制，且在 5%的基础上显著为正；模型 6 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淘宝村每增加 1 个单位，地区经济水平就相应提高 0.021 个单位，影响效应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7 表达了经过去中心化处理后淘宝村和移动互联网的交互项依然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城镇化水平。说明移动互联网在淘宝村建设对农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且强化了二者之前的促进效应，研究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4 移动互联网的调节效应检验分析结果

变量 Variables	模型5 (5)	模型6 (6)	模型7 (7)
tbc*net	0.007** (0.000)	0.021** (0.014)	0.042*** (0.033)
logC ₁		0.138 (2.302)	0.138 (2.302)
C ₂		-0.127 (0.079)	-0.127 (0.079)
C ₃		-0.170** (0.074)	-0.170** (0.074)
C ₄		79.661***	79.661***

		(11.781)	(11.781)
C ₅		98.565***	98.565***
		(10.966)	(10.966)
logC ₆		11.001*	11.001*
		(6.446)	(6.446)
C ₇		7.098	7.098
		(19.207)	(19.207)
C ₈		-6.430	-6.430
		(5.073)	(5.073)
logC ₉		10.587***	10.587***
		(2.462)	(2.462)
C ₁₀		0.450***	0.450***
		(0.089)	(0.089)
logC ₁₁		9.821***	9.821***
		(2.636)	(2.636)
C ₁₂		-3.237	-3.237
		(3.028)	(3.028)
C ₁₃		0.101	0.101
		(1.161)	(1.161)
_cons	50.044***	-152.934***	-152.830***
	(0.469)	(30.239)	(30.238)
Pro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279	279	279
R ²	0.991	0.996	0.99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3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淘宝村作为互联网时代下新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城镇化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在农村地区实践的多元化表现形式之一，城市化进程也被认为是影响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有效使用信息技术的程度也会较高。互联网的使用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而这种内生性问题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更为严重^[8]。本文从两个方面阐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第一，指标数据来源和统计层面不同。地区城镇化率为《中国统计年鉴》发布，而淘宝村数量来源于阿里研究院，从属于不同的数据库；影响地方经济的因素多且复杂，除去本研究中所涉及的13个相关指标外，仍有未被关注到其他相关因素对地区城镇化水平存在影响；第二，参考现有文献，本文通过对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滞后一期再次回归来处理内生性问题^[14]。根据回归结果（表5），淘宝村对地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影响程度明显滞后一期值，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tbc*net	0.016***	0.011***
Pro	Yes	Yes

Year	Yes	Yes
N	248	248
R ²	0.980	1.000
F	202.52	144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双侧缩尾处理和剔除直辖市两种方法对实证过程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对所有变量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调整样本容量后重新进行回归；第二，因直辖市的经济和政策发展优势，为保证结果普适性，本研究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 个直辖市后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6。回归结果显示，两种检验方式下，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均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双侧缩尾 1%		剔除直辖市	
	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tbc*net	0.017***	0.010***	0.007***	0.004**
Pro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47	247	243	243
R ²	0.992	0.997	0.980	0.985
F	210.49	128.40	233.22	264.8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

3.4 异质性分析

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功能日趋多元、空间结构快速重构、空间密度显著提高三个空间演化总体特征。我国区域区位特征、经济水平、文化传统、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差异显著，可能会造成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多尺度地理分布格局来看，中国淘宝村当前的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在省域层面上，淘宝村有显著的沿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省）周边集聚的特点。在县域层面，东部地区集群发展，中西部及东北部零散分布。在行政单元层面呈现出“东中西”的横向梯度格局⁵。基于此，为了探究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分别对不同地区展开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bc*net	0.021*** (0.033)	0.015*** (0.027)	0.000 (0.000)
logC ₁	3.180* (1.844)	-4.036* (2.193)	8.679*** (2.714)
C ₂	-0.063 (0.062)	0.560*** (0.154)	-0.128 (0.096)
C ₃	-0.094 (0.058)	0.484*** (0.163)	-0.145 (0.100)
C ₄	51.949**	-1.761	-6.827

5.1997年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决定设立重庆市为直辖市，并划入西部地区，2000年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又增加了内蒙古和广西。目前，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12个，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份。

	(19.772)	(20.350)	(20.837)
C ₅	98.301***	184.172***	-47.726***
	(15.454)	(19.520)	(17.827)
logC ₆	-11.473*	-10.792	24.270***
	(6.189)	(11.292)	(5.929)
C ₇	33.530**	-23.429	32.637
	(12.446)	(15.528)	(38.754)
C ₈	-5.983	7.963*	17.410***
	(4.651)	(4.255)	(4.995)
logC ₉	5.333	-3.899	6.676***
	(4.331)	(4.977)	(2.066)
C ₁₀	0.668***	0.275**	-0.152
	(0.088)	(0.107)	(0.112)
logC ₁₁	-1.670	-6.210	-26.531***
	(2.104)	(4.672)	(3.180)
C ₁₂	-2.501	4.868**	6.367
	(3.454)	(2.293)	(6.775)
C ₁₃	2.314**	-2.599	0.303
	(1.112)	(2.219)	(0.836)
_cons	14.206	0.930	30.921
	(35.448)	(53.024)	(31.087)
Pro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N	72	99	108
R ²	0.997	0.983	0.9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7表达了淘宝村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地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拟合良好，而西部地区受淘宝村发展的影响效用并不明显，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息技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空间扩散的递进规律，假说三得到验证。东部地区优越的电商基础、发达的交通条件、开放的市场环境及成熟的资源配置是淘宝村快速生长繁殖的沃土。同时，由于淘宝村“裂变式”增长和集中连片发展模式的长期存在，新生淘宝村主要在集聚在东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六省）的淘宝村总量保持绝对领先，而较大的基数和不断加密的空间集聚效应使得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态势不断得到强化。相较于电商基础雄厚的东部城市，人文积淀深厚的中部省份的淘宝村主营产品主要涉及农产品、传统手工艺以及工业制品等地方特色农产品。传统乡镇中被规模化工厂大幅度挤压的传统手工作坊，迅速复苏并催生出一批民俗文化浓厚的淘宝村，如湖北十堰涧池乡下营村（绿松石手工艺制品），河南许昌灵井镇霍庄村（社火道具）等。相较于中东部地区，受经济水平、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等各种因素掣肘，西部省份自发形成淘宝村的难度相对较大。西部地区的淘宝村大多是特色型淘宝村，主要基于当地的自然要素禀赋和传统技艺而存在，产业存在较强的地方黏性，难以被复刻或实现规模化生产，空间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均不明显。且西部地区的淘宝村多呈点状分散分布，大多位于省会或门户城市周边，溢出效应尚不明显。如云南省大理草海镇新华村（传统手工银器）、新疆乌鲁木齐仓房沟村（蜂蜜）等。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淘宝村能显著提高对城镇化水平,它并非传统意义上依靠上级政府扶持的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是基层政府、广大农民、社会组织、电商企业等合力参与形成的就地城镇化,推动主体和空间载体的双重下沉,从底层激活了城镇化长期以来的休眠主体;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能显著提高淘宝村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主要是通过跃迁的就业非农化、全面的生活现代化和集约的空间城镇化三个方面来影响淘宝村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移动互联网调节下的淘宝村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中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高,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需应该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策略。

4.2 政策建议

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淘宝村需要彻底的转型,改变长期积累的空间治理失序现象,作为信息时代的一场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变革,淘宝村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类型与路径的多元与实操性,更在于村民对信息壁垒的突破与权利意识的觉醒。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交织与冲突,淘宝村建设需呈现出更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方式,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令人向往的新乡村社会。第一,针对就业非农化,需进一步拉动农民就地就业。面向未来城乡聚落体系中乡村可能扮演的角色,持续拓宽乡村的功能与产业发展基础,促进乡村产业接入区域分工,通过促进适应性非农生产要素,来集聚推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二,针对生活现代化,需持续释放乡村文化活力,在保障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基本均等的基础上,同时要差异化地保持或赋予乡村丰富的内涵地位,通过重构具有高度适应性、文化结构完整的乡村社会,激活乡村内生造血功能。第三,针对空间城镇化,需促进乡村社会的空间重构与治理重构。前者主要为建立符合现代要求的生活、生产空间,有选择地建立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满足乡村居民不断提高的消费要求;后者主要体现为建立在现代化生产分配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和治理结构,即在市场、政府与村民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组合与平衡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程梦瑶. 迈向高质量发展: 基于“七普”数据考察我国人口城镇化新阶段[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02): 93-103+57.
- [2]赵振, 彭毫. “互联网+”跨界经营——基于价值创造的理论构建[J]. 科研管理, 2018, 39(09): 121-133.
- [3]罗震东. 新兴田园城市: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镇化理论重构[J]. 城市规划, 2020, 44(03): 9-16+83.
- [4]朱满德, 赵琴, 程国强. 关系网络、企业家精神与新农人创业[J/OL]. 农业经济问题: 1-13[2023-04-21]. DOI:10.13246/j.cnki.iae.20230309.001.
- [5]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02): 268-274.
- [6]高军波, 孙健武, 喻超, 马志飞. 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的理论内涵及定量测度[J]. 地理研究, 2023, 42(06): 1465-1479.
- [7]刘震, 张晓星, 魏威岗.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03): 20-32+47. DOI:10.13317/j.cnki.jdsxb.2023.024.
- [8]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陈昌兵, 张平, 刘霞辉, 张自然.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9, 44(10): 4-21.
- [9]张雷, 朱守先. 现代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进初探——中外发展研究对比[J]. 地理研究, 2008(04): 863-872.
- [10]程开明. 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9, 26(05): 40-46. DOI:10.19343/j.cnki.11-1302/c.2009.05.006.
- [11]蒋时节, 周俐, 景政基. 分类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09): 61-64.
- [12]任杲, 宋迎昌. 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与阶段性研究——基于产业发展与户籍制度变迁的视角[J]. 兰州学刊, 2018(06): 145-158.
- [13]李玉文, 侯新烁, 李五荣.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J]. 经济地理, 2021, 41(09): 91-102. DOI:10.15957/j.cnki.jjdl.2021.09.010.
- [14]程秋旺, 许安心, 陈钦.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02): 115-126.